

女性译者主体性探究

——析戴乃迭英译《沉重的翅膀》

张生祥 汪佳丽

(浙江师范大学,金华,321004)

摘要:作为著名的英籍翻译家,戴乃迭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独特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和丰富的翻译实践使其成为研究译者主体性极好的对象;而女性译者文化身份又为其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在后期的独立译介活动中,作为一名女性译者,戴乃迭积极主动地译介了大量中国女性作家作品,其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本研究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戴乃迭汉译英作品中体现出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沉重的翅膀》为具体实例,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副文本的操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关键词:戴乃迭,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沉重的翅膀》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5)08-0063-07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5.08.011

1. 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问题日益关注,译者的文化身份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著名英籍翻译家戴乃迭所具有的独特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译介行为和译介效果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在后期的独立译介活动中,她充分发挥女性译者主体性,积极地向海外介绍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得到了西方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的认可和接受。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直接取材于我国正在展开着、流动着、旋转着的现实生活,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杨建国 1986:2),“而在戴乃迭1987年的英译本中,原作的女性主题和女性角色却得到了相当的彰显,小说的女性维度得到了相当的强调和拓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被当作女性文本解读”(付文慧 2011:18)。本文以《沉重的翅膀》的译文为例,着重分析戴乃迭的女性译者主体性在其中的体现方式及其中的女性主义特征。

2. 戴乃迭与女性主义的相遇

女性主义主要“致力于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根源、结果及解决途径的理论解说,以及期望给性别关系带来深刻变化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及重建工程的努

力”(吴小英 2000:5)。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不断高涨、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主义理论的内容也日趋丰富。1949年,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打破了传统中认为性别天生的见解。“社会性别”概念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性别的差异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男女身份做出的不同价值评价”(梁巧娜 2004:7)。当女性主义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学者们也开始思考翻译中以前无人重视的译者性别问题:一直以来,译者和译文都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女性主义译者显性化译者身份,使其不再处于隐性服从地位。“不可否认的是,女性译者的特殊努力对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她们的女性特色必定让我们认识到:性别,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在翻译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杨朝燕、胡素芬 2007:120)。

路易斯·冯·弗拉德(Flotow 2004)将翻译置于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对“父权”语言进行批判的背景中,阐述了女性作品的翻译实践、译者大胆介入一些重要文本的翻译及以女性译者为焦点的翻译历史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他(同上:24)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很多女性译者声称应该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待原文本,一旦文本偏离了女性视角,她们就会对文本进行干涉,做出改变”。另外,她们还颠覆了传统的“忠实”观念,重新定义“忠实”,指出“忠实不是指忠实于作者或者读者,而是要忠实于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计划”(Simon 1996:2)。由此,译者与译文终于获得了与作者和原作平等的地位。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通常“采用三种常用方式: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prefacing)和脚注

作者简介:张生祥,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博士、德国波鸿大学社会科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翻译与翻译传播。电子邮箱:zhanglarry@126.com
汪佳丽,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wangjiali_happy@126.com
*本文系2014年度浙江省哲社研究基地课题(编号14JDFZ01YB)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来改写、操纵甚至占有原文,“为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蒋晓华 2004:13)。

戴乃迭的女性主义思想孕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即她的独立译介阶段。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氛围的松动,中西展开广泛的交流,戴乃迭借机与国外好友重新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狄利亚·达文(Delia Davin),一位在西方女性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学者。女性的文化身份使得戴乃迭本能地对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兴趣,此外,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也给戴乃迭主体性意识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于是,身为女性的戴乃迭积极投入译介中国新时期女性作家作品的工作中,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女性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

3. 戴乃迭女性主义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

翻译,是一个在译入语环境中重现原文中所描绘的文化图像或镜像的过程。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即接受者和传播者,其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查明建、田雨 2003:22)。在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过程中,戴乃迭在选择翻译文本、操纵副文本和实施翻译策略等三个方面力图彰显自己的女性身份,表达女性主义话语和思想。

3.1 翻译文本的选择

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意识首先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上,继而才会有译者对作品的解读和语言层面上的释义。戴乃迭拥有自主译材选择权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此之前,她虽然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独立译介活动,可是其翻译选材依然受到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即有促进或阻碍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个人和机构的影响。不管是之前的外文出版社,还是后期并入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作为国家级单位,两者均是为国家为政府服务的有着鲜明政治性的机构,故戴乃迭的翻译选材受制于当时的国家方针政策,译介作品以左翼和解放区文学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杨宪益出任《中国文学》杂志主编并提倡出版《熊猫丛书》,再加上当时中西方的正常交流,这两方面的变化成为戴乃迭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催化剂。作为一名女性译者,戴乃迭在选材方面倾向于新时期中国女性作家作品,其好友达文曾提及:“80 年代,她[戴乃迭]对妇女运动产生了兴趣,大量翻译了从文革中成熟起来的一批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参见杨宪益 2003:

152)。1982 年《当代中国七位女作家选》出版,并受到国外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肯定,戴乃迭继而大量译介了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包括独译与合译),如《张洁小说选》(1986)、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1986)、《沉重的翅膀》(1987)^①、王安忆的《流逝》(1988)等等。

3.2 副文本的操纵

“副文本”概念最早由法国文论家热奈特 1979 年在其《广义文本之导论》中提出,是相对于正文本而言的,一般“是指正文本周边的一些辅助性文本因素,主要包括标题、序跋、扉页或题下题辞、图像、注释等”(金宏宇 2012:171-172)。透过副文本,尤其是序跋,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译者对翻译的整体把握,包括翻译的缘由、翻译策略选择以及翻译思考(或思想)等多个方面。

3.2.1 撰写译者序

戴乃迭主动译介新时期中国女性作家作品,并对其译介作品撰写详尽的译者序。她从女性的立场出发,详实介绍作者的人生阅历和创作风格及主题,以其明晰的读者意识,将关注点转向女性话题,详细描述中国女性的真实生活情感状况。

在英译《沉重的翅膀》过程中,戴乃迭省译原作中的序言,从其女性译者身份出发,撰写了长达 1700 词的译者序。序文共 16 个段落,前三段落就张洁的生平以及创作背景进行简要介绍;第四段详尽介绍了张洁的著名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以此来说明这一时期其创作的内容和主题——爱和婚姻;接下来的几段将重点放在介绍《沉重的翅膀》的内容和主题,译者没有过多阐述其工业改革主题,而是将中心放在主要人物的个人幸福以及价值方面,指出文中的婚姻体制问题,总之不论是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发展,还是个人婚姻生活,或是张洁的创作之路,都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第 12、13 段分别介绍了张洁另外两部知名作品《方舟》和《条件尚未成熟》,前者被视为一部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后者则继续《沉重的翅膀》的经济改革主题,译者此举意在表明作者的创作主题:以社会现实为基础,探求个人价值与幸福感,尤其是女性;最后三段围绕着《沉重的翅膀》英译展开,译者解释了翻译过程中的省略和人物译名,并对比尔·詹纳尔教授(Bill Jenner)和达文对译文的润色表示感谢。

3.2.2 邀友人作跋

译者序虽然涉及到文本中的婚姻体制问题,但由于深受中国传统译学中“忠实”标准的影响,戴乃迭并未直指中国女性的地位及现状,而其女性译者主体性却完美地体现在邀请女性主义者达文为其英译本作跋上——借助赞助人的力量来完成对译作预

期女性主题的操纵。

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了翻译活动中的“赞助人”概念,他指出“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指的是促进或者阻碍文学阅读、写作以及改写的权力,包括人或机构”(Lefevere 1992:15)。在英译《沉重的翅膀》中,戴乃迭借助赞助人的力量,凸显译本的女性主题。作为个人赞助人,女性主义者达文花了大量篇幅对文中主要女性人物的性格、形象以及生活状态进行全面分析,如对于夏竹筠的描述:“被宠坏的副部长夫人,懒惰、傲慢、无礼、注重物质享受,从不真心对待他人”(Yang 1987:176)^②。译跋还对作者张洁的个人婚姻生活进行了简单介绍,以此来解释《沉重的翅膀》中缺乏更多的积极的女性角色。最后,达文指出,虽然张洁关于女性压迫的看法与西方女性主义者截然不同,但是其塑造的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给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当代社会之窗。

3.2.3 添加主要人物列表

除了序跋,添加在前言之前的主要人物列表,也充分体现了戴乃迭的女性关照意识。添加的人物列表,扮演着两个主要的作用:其一,突出女性人物;其二,易于译语读者理解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诚然强调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才是重中之重,戴乃迭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实现其关爱女性的目的。

(1) 赋予主要女性人物美丽的英文名字,而男性人物名直接用汉语拼音表示

表 1

主要女性人物		主要男性人物	
中文名	英文名	中文名	英文名
叶知秋	Autumn	郑子云	Zheng Ziyun
刘玉英	Jade	田守诚	Tian Shoucheng
夏竹筠	Bamboo	陈咏明	Chen Yongming
何 婷	Grace	莫 征	Mo Zheng
万 群	Joy	贺家彬	Ho Jiabin
郁丽文	Radiance	吴国栋	Wu Guodong

表 1 鲜明地表现出译者对于女性人物的偏爱和重视,其中叶知秋、刘玉英和夏竹筠的英文名分别译自她们中文名字中的一个汉字:秋、玉和竹。而何婷和万群的英译名则更具深意,作为小说中的负面人物何婷,她傲慢、倔强、邪恶、有野心、有计谋,然而戴乃迭却给予她“Grace”这样一个代表着优雅高贵有气质的名字,在渲染讽刺意味的同时,也表现出译者对人物的尊重和关爱。万群的英译名也如出一辙,原本一生孤苦无依,生活艰辛的她却被称为“Joy”,这是一种怎样的讥讽和嘲笑,人物命运的悲哀无法

改变,译者只能通过赋予其美妙的名字来为其人生点亮一点色彩。相比较女性人物英译名而言,男性人物只是简单地以拼音形式呈现,以烘托女性人物。

(2) 以女性为中心对主要男性人物的社会关系进行介绍

在介绍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位男性人物莫征时,列表中以“叶知秋的养子”(Autumn's adopted son)呈现,并没有以莫征为核心来介绍他其他方面的个人信息或者社会关系。同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对吴国栋的介绍是“刘玉英的丈夫,曙光汽车厂的工人”(Wu Guodong, Jade's husband, a worker at the Dawn Works),以其妻刘玉英为中心;对郭宏才和罗涛海的介绍,分别为“何婷在党支部的敌人”(an enemy of Grace's in the Party branch)和“何婷在党支部的同盟”(Grace's ally in the Party branch),均是以何婷为中心展开介绍。

(3) 添加主要女性人物的婚姻状况介绍

介绍男性人物时,重点放在其社会身份与地位,而对于女性人物的介绍除了社会身份,还添加了对她们婚姻状况的描述,意图将译语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女性人物的爱情、婚姻等方面,而不是去关注工业改革。例如在介绍何婷的时候,除了介绍她是一个恶毒的处长,还提到她那残疾多年的丈夫(whose husband is an invalid)。相似地,在介绍万群和郁丽文时,也强调了她们的婚姻现状:“万群,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寡妇”(Wan Qun, a widow who works in the ministry);“郁丽文,一名医生,嫁给了陈咏明”(Yu Liwen, a doctor, married to Chen)。

3.3 具体的翻译策略

社会语言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语言研究的交叉学科,结合语言学要素和社会环境,致力于“揭示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孙炜等 2010:1)。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她们的语言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独具特色。学术界对于女性的语言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当代丹麦语言学家叶斯珀森最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性别语言。1922 年,他在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一书中专门用一章“The Women”讨论女性语言特色。60 年代欧美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波及到语言学领域,女性语言得到进一步发展。1975 年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 Robin Lakoff 发表的著作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提出了“女性语言”的概念,进一步推进性别语言研究。在 Lakoff 奠定研究基础之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男女语言差异,对女性语言的研究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中被广泛关注的领域。戴乃迭作为一名女性译者,她的译文语言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她采取了怎样的翻译方法,

这些都值得探讨。下文将从词汇、句法、篇章等三个层面展开详细分析。

3.3.1 词汇层面

根据国家、语言以及风俗文化的不同,男女译者在选择词汇方面的差异程度也不同。而英汉词汇不论是构词原理还是搭配机制都相差甚远,女性译者戴乃迭在译文中灵活选择译入语中带有丰富女性感情及特征的词汇,以此来添加译文的女性主义色彩,突出女性人物。与此同时,她的选择倾向也折射出其女性语言特点在词汇层面的表现。下面就从动词、形容词及副词这三类词汇展开具体分析。

(1) 动词

“语言本身虽然没有打上性别的符号,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男女对于词汇的选择及使用频率上却有很大差别”(康卉、徐婧 2009:145)。用于形容或表示各类动作的词汇——动词,在句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动词将赋予同样一句话不同的表达效果,中文如此,英文亦然。戴乃迭在翻译中对一些动词的处理极具个人特色。张洁小说中描述陈咏明和郁丽文恋爱的动词吸引了译者戴乃迭的注意,她对于此类动词的英译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

例 1. 急急地脱下白大褂,饭也顾不上吃,赶到约会地点。饿着肚子,靠在他的臂弯里,花前月下地走来走去。(79)

As soon as she came off duty, she would miss her supper to nestle in his arms. (Yang 1987: 43)

例 2. 郁丽文等着。轻轻地向他更加靠近。陈咏明伸出手臂,搂着她的肩膀,她把头倚在他的肩上。(299)

Radiance nestled up to him, and he put an arm round her shoulders. (Yang 1987: 129)

例 3. ……把头靠在他宽阔的肩上,眼睛潮湿了。(80)

She rested her head on his broad shoulder, her eyes moist. (Yang 1987: 44)

例 1 和例 2 中的两处动作词汇分别是“靠在”和“靠近”,而在戴乃迭的译文中却以“to nestle”和“nestled up to”呈现给译文读者。译者并没有按照字面意思译为“lean against”,而是选取了 nestle(舒服地靠着;依偎)一词,以女性爱的依偎来突出他们爱情的甜蜜,对于小说中唯一一对幸福的夫妻, nestle 似乎是他们的专属动作。例 3 中的“靠在”并未采用与例 1 相同的译文,而是以“rested her head on”呈现,rest(依靠;依赖)强调女性身体动作的同时,也表明了其对男性的爱恋和深深的依赖。

(2) 形容词

作为社会和文化的载体,语言与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意识形态联系紧密。男女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差异导致其语言的差异性,“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倾向

于使用形容词”,特别是一些表现强烈情感的词如“gorgeous, lovely, cute, divine, precious, sweet 等,在女性中使用的频率较高”(康卉、徐婧 2009:145)。这或许是因为女性的情感世界比较丰富,对于事物的感知和形容也更加敏感,因此需要此类形容词来表述这种感知。

作为小说中唯一敢爱敢恨的女性,郑圆圆与其恋人莫征之间的感情也备受瞩目。他们第一次相遇时,首先是她的声音吸引了他。

例 4. 那天,他下班回来,突然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嗓音。(199)

When he came off the work that day, he heard a girl's sweet, soft voice. . . (Yang 1987: 89)

例 4 英译文中的 sweet 和 soft 很完美地诠释了女性人物美妙的声音,相比小说原文“突然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嗓音”,译文成功地凸显女性地位,提高了女性形象。“陌生的”未被直译成“strange”,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译者在翻译中词汇选择的特点。她们倾向于用一些寓意美好或具有丰富感情色彩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笔下的女性人物。

另外,对于小说中悲剧人物万群偶尔的幸福时刻,戴乃迭也通过选择带有褒义女性色彩的形容词来进行描写,提升其女性形象。

例 5. 而万群又变成一只咕咕的鸽子,虽然已不复是当年的那一只,多少还是老成了一点。(265)

... and Joy was dove-like in her affection. (Yang 1987: 119)

“男女在言语上,即在言语行为上有所不同。比如女性的言语行为,就有感情浓厚、色彩含蓄、风格细腻、情调温和……等独特的性别特色”(姚亚平 1988:38)。译者戴乃迭虽然改译了原文,但是却使得译文更加清晰地表现出万群那时那刻的幸福, dove-like 一词描述了纯洁可爱、天真无邪的少女情怀,表现出这个命运多舛的女性温柔多情的一面。

(3) 副词

副词一般而言,起着修饰强调的作用,“女性交谈中常用 awfully、pretty、quite 等程度副词起强调作用”(刘芳 2014:26)。戴乃迭在她的英译本中,除了提供原文中已有的副词对应表达,还通过加译程度副词,如“从不”、“总是”等来突出强调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感情和生活,扩大其女性维度。以小说中对女性人物夏竹筠和刘玉英的描述为例,

例 6. 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18)

Knitting helped to pass the time, though she never finished anything. (Yang 1987: 10)

例 7. 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23)

... Jade was the mainstay of the family. Without her they could never have kept going. Had he ever asked her how...? (Yang 1987: 14)

例8. 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 (24)

Divorcees were always despised... (Yang 1987: 14)

以上三个例子中,戴乃迭巧妙添加了 never、ever 以及 always 等程度副词,加强表达效果,一方面强调夏竹筠单调且懒散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突出了刘玉英婚姻的不幸,以及她个人的坚强。

3.3.2 句法层面

文学翻译中,句法的传译也是判定原作风格是否成功传译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如傅雷(1998:148)所言,“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戴乃迭的女性关照策略不仅体现在词汇层面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句法层面的具体操作上。本文没有将重点放在分析单句的成分、结构或者句际关系,而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戴乃迭如何通过句子类型的转换、转换表达使句意明晰化、句子加译以及省译等翻译策略,达到强调译文的女性特征的目的。

(1) 疑问句译成带程度副词的陈述句

没有任何一项规定指明哪些句法结构是仅供女性使用的。虽然“女性语言在句法上不及词汇那样有着明显的特点,但某些特点仍显示了语言上的性别差异”,“我们经常会发现女性在一些陈述句的后面附加反意疑问句,以达礼貌、客气、委婉、含蓄的作用。她们在表达思想时,很少采用直接的方法”(李红艳 2005:123)。而在戴乃迭的英译中,却呈现出不一样的表达。因为她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女性地位和形象,所以她不仅不会选择传统习惯里女性会采用的句法结构,相反,她还会以某种肯定、强调的表达来表明女性自信、果断的性格特点。

另外,在采用加译程度副词的方式来凸显女性人物的同时,戴乃迭将原文中的疑问语气译为陈述,以增加肯定的感情色彩。

例9. 爸爸、妈妈倒是有钱的,可是他们幸福吗?爸爸和妈妈什么时候心对心地说过话呢?他们什么时候肩并肩地站在窗前,看过雨中的落叶,看过树枝上的积雪?什么时候,为了一对依偎在一起、咕咕叫着的鸽子而会心地相对微笑呢?他们即使在家里,说的也是那些勾心斗角的臭事儿。他们作为人的那一面生活哪里去了呢? (205)

Her parents were well-off, but were they happy? They never talked to each other from the heart. Never stood side by side at the window to watch falling leaves in the rain. They just tried to score off each other. (Yang 1987: 92)

除了上文提到的“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

下去呢?”译为“Without her they could never have kept going”以及“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译为“Divorcees were always despised”,此例中郑圆圆对于父母的婚姻状态表述的译文也体现了这一翻译策略,显化了小说中隐含的爱与婚姻的主题。

(2) 转换表达使句意明晰化

“中国文化中的交际是以他人作为取向的,而西方文化里的交际是以自我为取向的。西方文化偏好直接的言语交际方式,而中国文化则看重间接、委婉的言语方式”(孙炜等 2010:137)。对于小说中带着浓厚中式色彩以及内容隐晦的句子表达,戴乃迭尝试转换表达,选择译入语中的相似表达,直接明了地表达句意,以求译文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此翻译选择,一方面考虑到生硬的直译会造成译文读者的阅读困扰,另一方面旨在显性化小说中的婚姻爱情关系,突出女性主题。以下面两例开展具体分析:

例10. 说归说,叶知秋相信,只要没有人看见,他一定会整天小心翼翼地把小刘捧在手里,倒好像小刘是个刚下的鸡蛋,而不是准备下蛋的母鸡。(13)

Still he looked after his wife very carefully. (Yang 1987: 9)

例11. 他没有那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但他立刻感到重心的倾斜和并不亚于被雷电击中的一种深深的忧伤。那是人们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面前所感到的绝望。(200)

... yet Mo Zheng felt thrown off balance. Cruel fate put such a girl beyond his reach. (Yang 1987: 90)

前例说的是吴国栋对于妻子刘玉英曾经的关爱体贴,原文表达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比喻,女人生孩子如母鸡下蛋,这样带有浓厚中国味的表达,如若直译,一方面贬低文中女性形象,另一方面,给译文读者带来累赘感和陌生感,因此戴乃迭转换表达,选择恰当的译入语表达,清楚完整地表现了原文的核心意思。后例用一句“那是人们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面前所感到的绝望”来表达莫征对于郑圆圆不可企及的爱恋,此处戴乃迭也同样转换表达,使得原文隐含的意思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such a girl”也突出了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

(3) 加译句子

除了在原文的基础上,以个性化的译法达到译者的预期目的,由于“女性的心理感受性比男性高,其言语行为感情成分就多”(姚亚平 1988:38),戴乃迭还根据小说中的人物感情关系,大胆加译句子,以补偿原文情感传达的欠缺,为译文读者提供明晰的阅读体验。具体实例如下:

例12. 叶知秋有点奇怪,一位重工业部的副部长,居然能和凡人一样,住在这公寓式的房子里? 别是贺家

彬记错了地址? 不会,他说过他曾经来这里坐过、聊过。

当然,也不能算什么凡人,至少是司、局级干部的宿舍。就是响着钢琴和敲击声的这个单元。(51)

Autumn was rather surprised that a vice-minister in the Ministry of Heavy Industry should be living in such second-rate housing. These were not flats for just anybody of course, but for middle-ranking officials. Not the sort of place, though, where most ministers lived. Because of this, she had a favourable impression of Vice-minister Zheng before she'd even met him. (Yang 1987: 29-30)

原文描述的是叶知秋在和郑子云的第一次见面前各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其中并未直接明述叶知秋对于这个副部长的好感,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在表达情感方面比较含蓄,而戴乃迭却通过加译句子,让女性的情感表露于人前,突出女性人物,也使得译文读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人物感情方面,再一次强调译文的女性主题。

(4) 省译句子

在某个语境中,加译句子旨在突出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情感、生活状态或者性格特征,强调译文的女性维度,而戴乃迭的译文中还省译了某些贬低女性、提升男性的句子,这体现了译者戴乃迭的女性译者主体性。此处先讨论个别句子或者句子群的省译,至于大面积大范围的段落缩减和删除,将在接下来的篇章层面给予细述。

在小说的 11 章,面对夏竹筠的哭泣,郑子云的心理描述是“走开是不合适的,人在流泪的时候,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弱者的地位,何况她还是个女人,男人是不能这样对待女人的”(248),此处戴乃迭省译,因为这句话反映了女性脆弱无助的一面,如若直译,未免贬低女性形象,因此,以关照女性为出发点,译者采取了省略译法。此外,对于小说中带有男权主义色彩的句子,译者也相应给予了省略,目的也在于维护女性人物,提升女性形象。例如小说中莫征的消极状态被具体描述为:

例 13. 郝圆圆那里,还有一把可以修剪他的剪刀。他的精神上所承受的全部社会压力,却靠两个女人的保护来平衡。生活竟把他推进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这样一种等待施舍的地位! 他还算什么男人。男人应该是强者啊! (198)

对于这样一段文字,戴乃迭并未给出相应的译文,其原因应该就在于回避男性主义色彩,维护女性人物和形象。

3.3.3 篇章层面

在以上词汇层面及句法层面的讨论中,译者戴乃迭的女性文化观和翻译观显得清晰具体,而其在篇章层面的译法处理也体现了鲜明的女性译者主体性。小说原著的篇章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存在大量

的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语言表达;二是作者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展开的过多的陈述说辞,对于以上两点篇章话语特征,戴乃迭在英译时均采取了省略译法,以清晰的读者意识为出发点。除此之外,戴乃迭在篇章层面的操纵还体现在缩减和省略贬低女性人物的表达,以及为了强调女性人物所做出的篇章内部表达调整等方面。

(1) 缩减和省略

小说第 12 章的内容可以具体体现篇章内部的缩减和省略。该章原文总共 245 段,而在戴乃迭的译文中仅剩 137 段,除去有关经济政治的言论以及多余陈述的缩减和省略,此处将重点放在分析以女性主义为出发点的缩减和省略上。实例如下:

小说原著中,张洁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贺家彬下班乘车去探望万群的车上经历,从 270 页的“还不到下班时间,车就挤起来了”到 272 页的“贺家彬觉得也许自己管得多余……反而更好?”而戴乃迭在英译时,将此详细叙述缩减成一段,只保留了其中的核心意义,将整个部分翻译成了“It wasn't the rush hour yet, but the bus was packed. To his disgust there was a row on it between a surly Beijing youth and a Northeastern woman loaded with luggage who bumped into him. Ho could not help intervening to defend her, but after he did the woman showed she could give as good as she got” (Yang 1987: 120)。

另外,从 253 页的“女人的逻辑”开始,一直到 256 页的“不过她是不会哭的。眼泪,是漂亮的、有人疼爱的女人才有的奢侈品”有关女性人物叶知秋的描述,戴乃迭在英译时,全部省略,原因在于这些句子表现出女性的脆弱以及他人对其的闲言碎语,出于女性主义关照,故选择省译。

(2) 顺序调整

戴乃迭还尝试调整篇章内部结构,以关照并强调女性人物形象。即使是对于小说中的反面女性人物何婷,戴乃迭在英译时,也灵活做出某些顺序调整,以此突出其某些方面的美好形象。

例 14. 四五年参加革命的一个满洲国的“电台之花”,很快地入了党。她是一个有头脑的、进攻型的女人。断然不肯留在文工团里,早就看准了“政治”这碗饭。(314)

In 1945 she had joined the revolution as a singer in the northeast. At fifty-five she still had a sweeter voice than most girls of eighteen. Having joined the Party early, she had shrewdly determined to make politics her career. (Yang 1987: 134-135)

例 15. 虐待? 换个别人试试,谁能守这十几年的活寡? 谁能这样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他? 他偏瘫的时候,何婷不过才四十多一点,因为生得白嫩,看上去也只有

三十六、七的样子。如今虽已到了五十多岁的年龄,竟还有一个甜得让你发腻,比十七、八的姑娘还嫩的嗓子。(315)

Who else could have put up for all these years with such an old dodderer? She'd been in her early forties when he had his stroke, though she looked in her thirties. (Yang 1987: 135)

例 14 中讲到何婷成功地从一名“电台之花”走上政治道路,小说原文强调了她的野心和抱负,并没有花笔墨去描述其在文工团的表现。而在戴译文中加译了表达何婷美妙嗓音的句子(见例 14 下划线部分)。然而,这句赞美何婷好嗓子的加译句,并不是戴乃迭凭空想象的,例 15 中下划线的句子正是其相对应的中文表达。由此看出,为了强调女性人物嗓音甜美这一特质,译者大胆做出了顺序调整。

4. 结语

女性译者的出现在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她们的数量少于同时代的男性译者,但数世纪以来,她们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随着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出现,译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问题日益关注;而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广泛开展,译者的文化身份(包括民族、种族、阶级、语言、职业、性别等)也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 20 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则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译者性别,因此女性译者主体性研究逐步得以展开和深入。

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作为女性的戴乃迭选择英译《沉重的翅膀》,首先体现了其在翻译文本选择上的女性主义倾向。继而通过撰写译者序、邀请友人作跋以及添加主要人物列表,来进一步表明其在翻译活动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最后在具体的文本操作阶段,戴乃迭充分发挥其女性译者主体性,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者的翻译策略:在词汇层面上,热衷于选择带有丰富女性感情特征的词汇;在句法层面上,通过句子类型的转换、转换表达使句意明晰化、句子加译以及省译等翻译策略,突出译文的女性主义色彩;在篇章层面上,缩减和省略贬低女性人物的表达,以及通过调整篇章内部表达来提升女性地位。此外,戴乃迭主动译介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女性作家作品,并取得一定成效。因此,关于戴乃迭文学译介的研究,尤其是其作为女性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对外译介具有积极

的意义,也为其他女性译者提供了借鉴。

附注

① 下引小说原文仅注页码。

② 为形成对照,本文所引小说英译文均用译者戴乃迭的姓(Yang)进行文内夹注。

参考文献

- Flotow, von Luise. 2004.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Lefevere, Andre.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imon, 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 Zhang, Jie. 1987. *Leaden Wings* (Gladys Yang trans.) [M]. London: Virago Press.
- 查明建、田雨. 2003.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1):19-22.
- 傅雷. 1998. 傅雷文集·书信卷(上、下)[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付文慧. 2011. 多重文化身份下之戴乃迭英译阐释[J]. 中国翻译(6):16-20.
- 蒋晓华. 2004.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 中国翻译(4):10-15.
- 金宏宇. 2012. 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J]. 中国社会科学(6):170-83.
- 康卉、徐婧. 2009. 英语语言性别差异的社会语言学初探[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145-46.
- 梁巧娜. 2004. 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李红艳. 2005. 论英语中女性语言的特点和对女性的语言性别歧视现象[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6(2):122-28.
- 刘芳. 2014.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英语中女性语言的风格特色[J]. 读与写杂志 11(3):26-27.
- 孙炜、周士宏、申莉. 2010. 社会语言学导论[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吴小英. 2000. 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朝燕、胡素芬. 2007. 朱虹与女性主义翻译观下的女性译者主体性[J]. 湖北社会科学(5):118-120.
- 杨建国. 1986. 浩瀚星海中一道奇异的光芒——读《沉重的翅膀》[J]. 语文教学与研究(9):2-3.
- 杨宪益. 2003.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姚亚平. 1988. 论性差交际学的理论和方法[J]. 汉语学习(1):41-42.
- 张洁. 1984. 沉重的翅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玄 琰)